

导 论

《新美国经济史》“新”在何处？

好了，到了该说些什么的时候了：不会太多。当牛仔裤是喇叭裤时诞生的‘新经济史学’，如今已不再很新了。然而新经济史学肯定是进步了，其中大部分原因在于新经济史学迄今已存在近 40 年——时间长得足以使三代有抱负的学者有所建树和创新。时间也长得足以让相关学科——例如社会史学和政治史学——吸收许多新经济史学的方法并视为己有。

当新经济史学真正很新时，其标志是将经济理论和统计方法运用于经济史研究，这与传统经济史研究中仅有一些经济学分析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当哈佛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康拉德和约翰·迈耶——于 1958 年开始探寻美国南部人在 19 世纪上半叶购买和养育奴隶是否理性这一问题的答案时，他们是在把这一问题作为一标准的投资问题来看待——好比这些南部人就是通用汽车公司，购买和养育奴隶相当于通用汽车公司决定为生产线购置新机器人。若市场机制起作用，则一个正常的投资者为一经济资产愿出的价钱会正好等于该资产未来收入的贴现值。此时，无论该‘资产’是一台新机床还是一个人，都不会影响到这一问题的理论架构。

康拉德和迈耶此举不仅解决了一个问题——奴隶制在整个儿美国南部的确是赢利的——而且在经济史这一学科掀起一场革命。^①

此后，起初是为数不多、随后大量著作和论文都采用了这一研究经济史的新方法。最早采用这一新方法的经济史学家有一个非常好听的绰号：“历史计量学家(Cliometricians)”——Clio 表示对历史的沉思——虽然我们很快就弄清楚他们之所以区别于以前的传统经济史学家，决不仅仅因为他们对数字和度量感兴趣。然而，这个绰号一直叫到现在，有关把经济理论和数

^① 其他人——罗斯托(1948)以及休斯和斯坦利·赖特(1958)——也声称自己最早使用了这一新方法。

量方法运用于经济史研究的年会,通常被称为“历史计量年会”,而由历史计量学家组成的团体也被称为“历史计量学会”。新经济史学”这一日后由休斯造的新词汇,现已被麦克洛斯基改称为“历史经济学”。虽然不是所有的经济史学家都支持新经济史学,甚至连新经济史学的那一套都不熟悉,但对经济史稍有兴趣的人都无法对“新”经济史学视而不见。

由康拉德和迈耶首先尝试的新方法已不再新颖,并且已不再有令人震惊的效果,但其阐释力仍在。新经济史学也不是静止不变的,相反,当经济学家的工具箱中不断有新工具和新见解出现时——可试举一些,无论是委托人—代理人问题、人力资本理论、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还是博弈论——经济史学家们发现这些新工具和新见解使自己能更好地解释过去。因此,新工具和新见解一经出现,经济史学家们便迅速采用之。不过,经济史并非仅从经济学中索取营养,它还有助于我们提高对经济学的理解。由于经过训练,并出于爱好,经济学家通常假定什么是什么,而很少对经济制度出现前经历的过程发问。时间是件麻烦事,或如著名的剑桥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所言:“时间是由经济学家为防止所有事情都立即发生而设计出的。”

然而历史却教会我们一种不同的时间观。长期内我们都将死亡,但我们的子孙后代能目睹演变趋势和革命性变化。经济史学家们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为,他们提醒经济学家,制度不是固定不变的:制度是有始也有终的,并且与经济学中最受喜爱的假设之一相反,偏好 (taste) 能够并且确实在变化。

以罗纳德·科斯(顺便说一下,科斯可是个了不起的家伙,他是 199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²⁰ 世纪 30 年代末的研究为起点,我们现已认识到,为建立并执行规则所进行的谈判存在成本。由此得出制度即妥协——无政府状态和僵局两者间的实际平衡——的观点。科斯用成本平衡来解释企业的起源。类似的思路还可用来解释在奴隶制消亡后的美国南部,为什么收益分成制会成为主要的租佃形式。

不过,经济史学家们并不仅仅力图合理解释制度和后果。他们还力图理解制度如何塑造未来以及事件如何决定了后果;如果你愿意,你可称之为路径依赖或历史决定主义。路径依赖的过程,例如“QWERTY”,打字机键盘的采用(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这正是我们大多数人熟悉的键盘左边最上面的头六个键),以及配电时采用交流电,我们在理解它们时,通过试图理解变化的动态过程——运转结构——也与旧传统一刀两断。其结果,经济学家被迫去努力解决不可逆性问题(即“锁定”),免得再去考虑未被采纳的

路径。

例如,让我们想一下,为什么键盘的安排会以 QWERTY 为标准?这当然与逻辑或语言学(英语或任何其他语言)无关。确实,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保罗·戴维认为,这正是键盘之所以有如此安排的原因。他的解释(虽未被所有人接受)是:这种键盘安排虽然只是 19 世纪末大量相互竞争的键盘安排中的一种,但却解决了一个技术性问题。在早期打字机的设计中,键盘和铅字连动杆之间的机械联动装置,其运转时的速度甚至慢于一个中等熟练的打字员的打字速度。其结果,铅字连动杆会缠结在打字机的滑架上,解决方案有两个:一是让铅字连动杆以更快的速度回到原位,但这要求有更强的弹力,而这反过来又要求,或者按键盘时力气加大,或者联动装置的机械杠杆作用更大;二是让打字员的打字速度因设计变动而降下来!

克里斯托弗·肖尔斯(Christopher Sholes)是世界上第一台实用打字机的发明者,他采用的方案就是后一种,他的带有 QWERTY 键盘的打字机由雷明顿公司(Remington)批量生产。QWERTY 键盘使英语中常用的、并且在键盘上彼此相邻的字母串数目达到最小。QWERTY 键盘还使常用的符号离打字机上有原位键的那排更远,并使发力较弱的手指去击打这些较常用的符号。此外,QWERTY 键盘还使相邻字母的铅字连动杆的击打方向尽可能相反,从而使铅字连动杆彼此缠结的可能性最小化。

不过,确保 QWERTY 键盘在竞争中最终取胜的是雷明顿公司在市场上的支配地位。这点使得大多数打字员必须学会使用 QWERTY 键盘。只有这样,打字员才能获得某种人力资本——熟悉 QWERTY 键盘。当然,打字员也可以接受再培训(为的是能使用非 QWERTY 键盘),但只要打字员是女的,雇主承担培训费用的激励就很小,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女性不会有在家庭之外工作一辈子的热情,更谈不上为某个雇主工作一辈子了。其结果,QWERTY 键盘延用至今,尽管上述其诞生的理由早已无踪影,可以肯定的是,电脑键盘的布局尽可由你迅捷而又简单地重新安排为你所想要的任何式样。相反,虽然我们会抱怨其它键(例如 <Alt>、<Ctrl>和 <Esc>)的布局缺乏一致性,但大多数仍一直使用熟悉的 QWERTY 键盘。

此外,经济史学家们还能对重大问题提出非常见解。以经济增长为例,有关总收入和人均收入的统计数据能使我们知道这些数据是多少(如果这很重要)——噢,下一章你们将会看到这一点。然而这种数据显示出的问题决不仅仅是统计数据的枯燥无味:我们想推断出人们的生活质量,但像人均收入这样的经济指标是不完美的衡量。现有经济证据(1840 年之前的经济证据越来越粗略)表明,一代接一代的美国人已享有了近 300 年真实收入上

升的好时光。基于此，人们很想做出这样的假定：生活质量迈着大致紧密的步伐不断上升。不久以前，在支持抑或反驳这一假说方面，我们手中系统的历史证据尚很少。但最近芝加哥大学由罗伯特 W. 福格尔领导的研究小组，已开始对大量生物医学和生物统计学方面的历史数据，尤其是各年龄上的身高数据进行加工整理，从而使我们得以用新观点去研究这一问题。

为了解军队情况的一个入门，人们经常搜集的数据就是军人的身高。美国只有自法英七年战争（1756—1763 年）以来的数据，而有的国家的历史数据则要早得多。身高这种数据在我们需了解生活水平时，能在至少一方面提供新见解，即老百姓吃得有多好。我们在实验室里所做的动物实验，以及我们对人口数的科学观测已表明，下列指标均为平均营养状况的可靠指标：特定年龄时的身高和体重，身体停止发育时的年龄，最终身高，以及身体发育年份期间身高和体重的变化速度。尽管人们就环境因素（包括营养状况）和遗传因素在解释一个人身高变化时孰重孰轻这一问题争论不休，但由于上述数据对诸如真实工资和真实收入这样更为传统的指标起了补充作用，故这些数据成为人们衡量生活水平时极为宝贵的确证。高收入几乎总是与高身高相联系，虽然我们不能基于此就说高收入是高身高的原因。此外，尽管婴儿时期、青春期前和青春期这两个“长个儿”期的身高变化，对当期的营养水平很敏感，但最终身高不仅反映了一个人累积的一生营养，还反映了这个人的母亲甚至更早几代人的累积一生营养。

美国最早的身高数据是从法英七年战争开始的，它们表明 24 岁至 35 岁的美国新兵要比同时期的英国新兵高出 3 英寸至 3.5 英寸。^① 由于殖民者中英国血统的占绝大多数，所以这表明 19 世纪中期美国新兵的累积一生营养远胜于同期的英国新兵。的确，对英国数据的研究表明，就连桑赫斯特军校——其在英国的地位相当于西点军校在美国的地位——的学生也只是与普通美国人一般高。^② 然而对目前的这场争论来说，更重要的是独立战争前的美国人几乎与二战时的美国新兵一样高，即平均 68.1 英寸（见图 1）。因此，早在几乎 200 年前，美国人就达到了现代身高。

美国人的平均身高至少从 18 世纪 40 年代开始就已在增长，并且南部人略高于新英格兰人，乡村居民高于城市居民。上述趋势在南北战争前的早期就一直存在。到了南北战争时期，加入联邦军队的新兵平均身高为

① 索科洛夫和比利亚弗洛尔（1982）。

② 弗劳德（1990）。

68.5 英寸。^① 1820 年以前出生的新兵比 1820 年之后出生的新兵要矮些，但 1830—1835 年之后出生的新兵，身高又开始下降。

接着，美国土生土长的白人男性的身高开始了一次长期的并且是百年不遇的下降，这次下降显然直到 19 世纪 90 年代才发生逆转。在这期间，美国人的最终身高下降了 2 英寸，为 66.5 英寸。自那以后，美国人的身高开始恢复，并且甚至超过了以前的水平。在上述百年不遇的身高下降期里，身高下降也曾有过短暂的中断，即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 10 年里出生的美国人，他们的身高稍有恢复。

这是否意味着生命质量有所恶化？答案似乎是有保留的同意——虽然我们正在等待最后的定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从独立战争结束后到 1860 年左右的时期里，生命的长度在减小。10 岁时的预期寿命在 1790 年达到顶峰，为 56.7 岁（见图 1）。此后，这一数字在南北战争即将发生前降至 47.8 岁的最低点，并在此后上升到 70 岁以上。

虽然在变化时的时间安排上，预期寿命和身高并不完全一致，但两者的变化模式相似。并且尽管下降时预期寿命在身高之前，提高时预期寿命也在身高之前，但一种解释就能同时适用于两者。原因可能在环境方面，城市化增加了传染病的传播机会，从而导致早期的预期寿命下降。另一方面，1850 年后的预期寿命上升，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公共卫生的改善，尤其是供水系统的改善。在城市，随着工业化的进行和食物供给链的拉长，与污染和营养不良同时发生的是身高的下降。

前不久历史学家对经济学家写的经济史仍抱很深的偏见，由于认为经济学家不懂历史却又又要写历史，所以他们对经济学家写的经济史口诛笔伐。希腊字母和回归方程式印在书里面也许看上去很棒，但它们使得无论书面还是口头的论证都软弱无力。而且，难道我们不应该关注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为什么会成功，而平民党的改革者为什么会失败吗？历史学家认为应该关注，而新经济史学家的态度往往被人们认为是不必关注。

上述情况已经改变。与以前相反，历史学家和历史计量学家发现彼此都可从对方身上获益不少。历史计量学的支配性主题已不再是揭历史学家同行的“短”了，相反，用一种思想方式取代另一种思想方式，从而对美国经济史进行普遍的再解释，已成为历史计量学的支配性主题。此外，类似历史计量学家采用的方法在社会科学各领域正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新经济史学、新社会史学和新政治史学等等，就像它们各自的母学科一样，是相互补

^① 马戈和斯特克尔（19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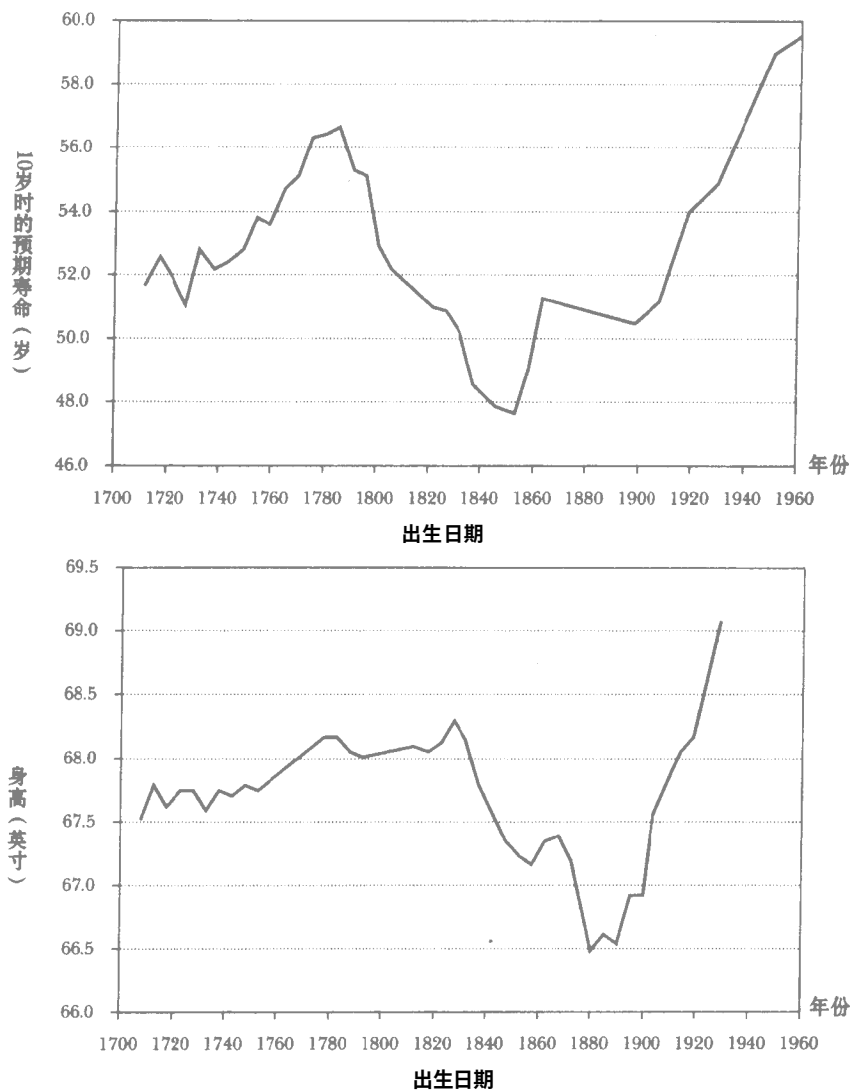


图 1 1710—1970 年美国土生土长的白人男性的预期寿命和最终身高
来源 罗伯特·福格尔,“1700 年以来的死亡率下降和营养”。该论文收录在斯坦利·恩格尔曼和罗伯特·高尔曼主编的《美国经济增长中的长期因素》(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6 年)一书中。图 1 即来源于该书的表 9.A.1。

充的。这种互补性会产生出同床异梦的盟友。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我们已对铁路管制的起源作出如下重新解释：对铁路进行管制是为了满足被管制的工商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利益。这一解释与马克思史学一致。

对于沉迷于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范式的经济学家而言，历史经济学也能给他们很大帮助。数十年来，通过将经济学的每一领域都数学化，并给予受主观性影响最少的专业——数学理论——以特别的荣誉，经济学家一直在努力使自己以“软”科学家的形象出现。而经济史则提醒经济学家自己的根仍在人类学科中的历史和哲学。这也许让经济学家感到不舒服，但正如罗伯特·海尔布罗纳（Robert Heilbroner）的评论所言：“数学给经济学带来了精确，但不幸的是，数学也带来了死亡。”

在经济学的部分领域趋向于正规理论化的同时，新经济史学却一直保持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我们所得到的教训是：历史真的很重要，这不仅表现在路径依赖的过程中，而且表现在历史上类似的事件，我们对变化的认识，以及我们力图对内在过程的理解中。

即使是那些对过去根本不感兴趣的经济学家，我们也可对他们说出学习历史经济学的理由。对经济过程的理解使得对当代问题的分析更容易了。许多当代问题，例如外国的竞争和贸易保护主义，巨额财政赤字的资金来源，国际债务危机，银行破产，股市崩溃，以及工业和人口的地理迁移，在历史上都有其先例。在当代问题的历史上，我们看到许多事件一幕幕上演。并且，就所搜集当代数据的多寡而言，我们采集当代数据的实际目的就是为了理解历史上的这些事件。而对过去的兴趣和关注与我们对当代问题的兴趣和关注并无多大不同。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尤其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学家采集有关经济周期的数据，力图理解经济周期的起源、后果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控制。二战结束后的 25 年沉浸在经济增长和普遍乐观的情绪中，因而经济周期研究显得停滞不前，但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经济周期的再冲击又复活了人们对经济周期研究的兴趣。经济史学家由此发现自己幸福地充当了该领域累积下来的知识的保卫者，而对经济学而言，此时这些累积下来的知识已湮没于时间和上代人的心智中。如下主题也具有现代意义：技术变迁的决定因素，对教育进行公共投资所得收益率，政府管制对运输的影响，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奉行自由移民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地区经济专业化的影响，以及战争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我们希望对上述每一主题都能提出新见解。

尽管经济学家都渴望成为客观的科学家，但他们仍经常沦为未经检验的理论的囚犯。过去岁月里产生的理论成了我们对今天的假定。在实际中，这样的传统不可避免。然而，好的经济史能使经济学家具有批评精神。我们可以避免‘特征’（它简直就是‘错误’的同义词）事实。

经济史学家还有另外两根橄榄枝提供给经济学。第一，在经济学中，认真对待假设检验的领域很少见，而经济史就是其中之一。阅读经济史的经济学家可能会碰到如何富有想象力地和富有创造力地——并且是完全正确地使用经济计量学这一问题。经济史学家们不会仅仅满足于报道统计结果，关注结果的统计显著性，以及结果是否与理论所要求的相一致。经济史学家实际上要分析结果，讨论每个估计值的含义及其独立贡献的大小。第二，尽管新经济史学早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兰斯·戴维斯曾以讥讽的口吻说：“经济史再也不会是文学作品了。”但经济史著作在文笔上仍旧比大多数经济学著作优美。这或许也是因为写经济史时说理至少与微分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事实也的确如此，罗伯特·福格尔的著作在经济学著作中堪称文笔优美的典范。

本书的主题远远不止于讨论电脑键盘上的键或是奴隶制的赢利性。本书通过展示新经济史学的研究成果，力图明察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我们的目的是要增进我们的知识，以及为了能理解现在而去理解过去。

本书讨论的问题及论述时的侧重程度，与历史经济学文献中所讨论的问题及侧重程度大体一致。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否则像奴隶制及其后果这样的论题也许会占本书篇幅的三分之一——这与奴隶制在美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不协调。大多数篇章论述的是具体的题目：南北战争前美国关税政策的基石是什么？奴隶制是如何影响南部发展的？大萧条的原因何在，它为什么发生在 1929 年等等问题。我们大致按时间顺序来安排论题，但本书并不打算完全按时间顺序回顾美国经济的发展。这反映了在新经济史学的研究中，按题目论述居支配地位。本书还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使用时间数据进行的研究为数很少，并且即使使用，一般也受时间长度限制，通常最多长至 20 年到 30 年。不过，下一章论述的是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还有一章论述的是人口，这两章在时间跨度上覆盖了美国发展的整个儿历程。

阅读本书的学生应该熟悉一些基本的经济学概念（本书末尾附有术语和概念汇编），并且看得懂一些简单的图表和算术关系式。的确，我们对学生的希望之一就是读完本书后，他们在使用经济理论去阐释政策问题——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当代的政策问题——方面，有更深的领会。

参考文献

- Coase, Ronal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1937):386—405.
- Conrad, Alfred, and John Meyer. "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6 (1958):95—130.
- David, Paul.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1985):332—337.
- Floud, Roderick, Kenneth Wachter, and Annabel Gregory, eds. *Height, Health and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Fogel, Robert. "Nutrition and the Decline in Mortality since 1700: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In *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Stanley Engerman and Robert Gallman, e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439—527.
- Hughes, Jonathan R. T., and Stanley Reiter. "The First 1 945 British Steamship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53 (1958):36—81.
- Margo, Robert, and Richard Steckel. "Heights of Native Born Whites during the Antebellum Perio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3(1983):167—174.
- Rostow, W. W. *British Econom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8.
- Sokoloff, Kenneth, and Georgia Villaflor. "The Early Achievement of Modern Stature in America." *Social Science History* 6 (1982):453—481.

第 1 章

美国的经济增长 长期视角

美国的经济史是一部成功的故事。其间,美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和发展。1620 年定居在这块未来成为美国的土地上的外来移民,人数只有 2 300 人,其中大部分是英国人,还包括 20 名左右的非洲奴隶。^① 他们生活在饥饿边缘和时刻出现的武力威胁之下,还遭到传染病的毁灭性打击。然而,他们生存下来了,力量也因波涛汹涌的外来移民浪潮而得到加强,他们在此生息繁衍。到 1990 年,美国人口已接近 2 亿 5 千万,世界上几乎每个人种和少数民族的后裔在美国都能找到。美国拥有 3 000 万非洲裔美国人,2 200 万西班牙裔美国人,700 万以上的亚洲裔美国人,以及近 200 万土著印第安人。虽然美国至今仍未能完全消除饥饿、武力威胁和传染病,但美国人民享有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之高,使得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对美国人民羡慕不已。其结果,太多的移民一直把美国作为其最佳选择。^②

经济史学家们已搜集了许多证据,以明察美国的经济增长,本章即是要讲述这些证据。对殖民地时期和建国初期美国经济增长的估计大体是猜测性的,但越来越多的大量见解独特的确证支持了这些估计。至于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初叶美国经济增长的估计值,它们是在对人口普查年基准估计值使用插值法后得出的。美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因素会在本书其余许多章中得到详细阐述。

可以把经济想象成一个“黑箱”。在把诸多要素投入——工作时间、土

^① 实际数字仍有争议。美国人口普查局(1975 年)的序列 Z1-19。标明人数为 2 302,其中包括 20 名黑人,这 20 名黑人的身份未得到进一步说明,但许多人认为他们是奴隶。这一非洲裔美国人(或更准确地说,非洲人)的人数记载显然来源于约翰·罗尔夫(John Rolfe)的一封信,信中说,1619 年一艘全副武装的荷兰船到达弗吉尼亚,并把“20 余名黑奴”带上岸。不过,不管这一数字具体为多少,麦克洛斯基认为这 20 多人几乎可以肯定是奴隶,且他们的到达也不是偶然的。参见麦克洛斯基(1986)。

^② 见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美国统计摘要:1992 年》(华盛顿特区:GPO,1992)中的表 16。

地丰产、管理才能和机器小时——放进这个‘黑箱’后,出来的是人们认为有用并且想要的产品和服务。^① 产出的增长取决于这些要素投入的增长,以及使用这些要素投入时的效率高低。投入增长所导致的增长被称为外延式增长,而每单位投入下的产出增长所导致的被称为内涵式增长。举例来说,外延式增长在如下情形中出现:劳动力增长(不管是外来移民导致的劳动力增长,还是由于儿童数目的增加快于老年人数目的减少所导致的劳动力增长),耕地增加,以及更多的机器投入使用。另一方面,内涵式增长出现于如下情形:技术变迁,产出结构的变化,以及其它原因导致的生产率增加。外延式增长只是描述经济的规模,即如何使经济规模“更大”;而内涵式增长则大体可被视为使经济变得“更好”,因为内涵式增长使得人们付出同等努力却比以前得到并消费更多的东西,或者只需付出较少就能享有相同的消费水平。无论是外延式增长,还是内涵式增长,美国均已享有。

虽然我们经常谈‘增长和发展’,即‘增长’和‘发展’是同时说出的,但经济增长在概念上就有别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涉及经济社会制度以及人们看法的根本性变化,例如用平安稳固的体制代替不确定的产权,人们对工作的态度发生变化,日益依赖市场,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人们修正自己对生命的质量和长度的预期。这样的变化常常伴有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刺激经济增长。因此,举例来说,美国宪法于 1789 年被正式通过,这一事件被许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视为美国成功的关键所在。因此,今日的东欧国家在为其公民和经济制定新的方针政策时,都要借鉴美国的社会、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

殖民地时期

大多数殖民者从事农业,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对于从最初定居到美国独立的这一个半世纪时间,我们除了知道农业产量的增长至少与人口增长同步,对于这一时期的产出增长率我们知之甚少。而对于要素投入这一边,我们知道(或通过猜测)得更多。土地的供给实际上是无限的,至少从殖民者的角度看是如此。拥有土地的机会成本为:清理土地,并保卫土地使之免遭

^①我们在本章附录详细说明了对外延式和内涵式两种增长的度量和解释。

野生动物、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侵袭。而另一方面，资本奇缺，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于土地而言都是如此。殖民者若想使自己的消费水平上升一点，则所需的资本积累过程只能是非常缓慢的。资本大部来自殖民者在淡季从事的如下劳作：清理土地，挖掘沟渠，以及建造篱笆和谷仓。人口是劳动这一主要要素投入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我们对美国人口状况知道得很多，这多亏殖民地时期的人口普查种类繁多。虽然在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殖民之初时的人口不多，但殖民地人口此后一直迅速增加。到 17 世纪 60 年代超过了 10 万人，到 18 世纪 40 年代突破 100 万人，并在独立战争前夕达到 250 万人。^① 这相当于殖民地人口以年平均 3.5% 的速度在增长，照此速度增长的结果是：人口每 20 年翻一番；而现在美国的人口年增长率不足 1%。^②

殖民地人口尽管增长迅速，但没有证据表明由此导致人均产出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定居地的边缘——即边疆——可向后推进。的确，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代人口经济学先驱托马斯·马尔萨斯，就曾特别关注美国，并想以美国为例现身说法，说明若没有饥荒、战争和疾病来抑制人口增长，后果将不堪设想。人口会呈指数增长，而如果这种增长发生在自然环境不如美国的地方，则人口增长速度很容易超过生产手段的增长速度，从而造成人口危机。但美国与此正相反，殖民地时期，由于产出的增长稍稍快于人口增长，所以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改善。

一些较早对殖民地时期人均收入进行估计的人认为，1710 年殖民地白人的人均收入低达 28 美元，^③而罗伯特·高尔曼这位美国早期国民收入估计领域的主要学者则认为，28 美元几乎可以肯定是过低的估计。^④他作了如下推理：由于 19 世纪中期的价格水平与 100 年前的价格水平差别不太大，所以按 19 世纪中期的价格水平计算，1710 年的 28 美元只够一个人购买食物和燃料。于是，既然殖民者没有把收入全花在食物和燃料上，并且既然人均食物和燃料支出不可能在 100 年内显著上升，故这 28 美元肯定是过低的。⁴ 高尔曼提出另一种估计，他认为 1710 年实际人均收入可能介于 28 美元与当时英国的人均收入之间；而英国当时的人均收入约为 45 美元。此外，由于殖民早在 1710 年前的 100 年就已开始，故人均收入也不可能过低。

①见美国人口普查局（1975）序列 Z1-19。

② 用 72 去除以年增长率就可得出某数以此年增长率增长下去翻一番所需年数。这个所谓的“72 法则”极其有用，读者应记住。

③见泰勒（1964）。

④见高尔曼（1972）。

60 年后，也就是独立战争前夕，人均收入可能上升了三分之一。当然，与这之后相比，这种增幅很是一般（见表 1.1）。例如，在 1839 年后的一个多世纪时间里，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收入以年平均 1.6% 的速度在增长。我们对 1839 年人均收入的估计是相当可靠的，为 109 美元。假定人均收入在 1839 年之前就以 1.6% 这样的高速度增长，则独立战争前的人均收入就会低于 40 美元，而 1710 年的人均收入就会低到仅仅 13 美元——比此前最悲观的估计（28 美元）的一半还要少！即使我们对增长速度作出最有利的假设——人均收入在 1710 年很低，在 1775 年很高——殖民地晚期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也超不过 1%。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接受高尔曼更为可信的推测，即人均收入在 1710 年接近 45 美元，并在 1775 年增至 60 美元，则由此所得的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将不足 1% 的一半。

表 1 对 1710—1990 年美国人均收入的基准估计 (单位 美元)

年份	当年价格	1989 年不变价格 ^a	两基准年份间的年增长率 (%)
1710(泰勒的估计)	28	350	
1710(高尔曼的估计)	45	550	
1775	60	750	1.18 ^b 0.48 ^c
1840	109	1 350	0.91
1880	205	2 650	1.70
1929	847	6 150	1.73
1945	1 515	10 450	3.37
1960	2 788	11 100	0.40
1990	22 099	20 950	2.14

在向最接近的整数取整后，为 50 美元。

^b 使用泰勒对 1710 年的估计值而得。

使用高尔曼 1710 年的估计值而得。

来源 乔治·罗杰斯·泰勒“试探 1840 年之前的美国经济增长”，载于《经济史杂志》第 24 期（1964 年 12 月），复印已经剑桥大学出版社许可；罗伯特·高尔曼“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模式”，载于兰斯·戴维斯等人主编的《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该书版权©1972 归哈泼和罗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复印已经哈泼柯林斯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许可；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美国历史统计》（华盛顿特区：政府印刷办公室，1975 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美国统计摘要：1992 年》（华盛顿特区：政府印刷办公室，1992 年）。

尽管人均收入在 1710 年至 1775 年间的增长只算得上中等，但总产出增加了近 10 倍，这主要是在每年大大超过 3% 的人口增长率的驱动下取得的。正是这种外延式增长使得殖民地供养得起一支骁勇善战、战胜英军从而为殖民地赢得独立的军队，也正是这种外延式增长使得殖民地成为世界烟草、粮食和靛蓝贸易的主要供应商。

今天，许多经济学家都相信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增长严重阻碍了本国人

均收入的增加。由于个人收入决定于劳动生产率，所以低收入国家人口越多实际上就总是意味着人均产量越低，因为人均土地数量和人均资本会因人口增加而相应下降。在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海地这样的国家，人口的年增长率大致等于美国在殖民地时期的人口增长率，这种不加抑制的人口增长已使这些国家连将生活水平提高到在 200 年前的欧洲都被认为不宽裕的水平也几乎完全无望。在这些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多余的劳动力使得土地—劳动力之比和劳动生产率都下降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在 200 年前的美国，肥沃土地在定居地的边疆地带应有尽有，劳动生产率也未下降。相反，边疆还不断被向西推进。普通劳动力的产出的市场价值也未下降。在美国的产出扩大时，国际市场对美国产品的需求弹性很大，从而支持住了美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也就是说，当供给变动时，需求成比例的变化幅度要大于价格成比例的下降幅度——而良好的水上运输条件能使人们以合理的成本将商品运抵港口。其结果，殖民地能使在其人口上升 6 倍多的同时却无生活水平下降的代价。通过让殖民者利用运输方面形成的规模经济，外延式增长甚至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例如，在纽约和波士顿这样的港口城市，商品的存贮和运送费用在出航频率增加时会变得更低廉。

甚至殖民者也从未真正穷过。他们也许并不很富有，但决不会像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孟加拉国和海地那样陷入赤贫的境地。一些关键问题，例如市场经济的范围和代表性“市场篮子”商品的构成及其成本，使得在价格水平和收入上进行国际比较出奇地困难。^①例如，在一种标准下，1990 年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比殖民地时期要高出 12 倍或 13 倍，而其它较不保守的估计表明这一比例为 20:1 或更高。不过，比较能使人得到启发（见表 1.2）。若估计保守，则 1710 年人均收入 45 美元放在 1990 年相当于 550 美元，而若估计不保守，则 45 美元在 1990 年相当于 900 至 1 000 美元。但要知道，当今最穷的 9 个国家人均收入均在 200 美元以下，并且当今世界有 1/4 至 1/3 的国家人均收入仍低于 550 美元。因此，殖民地 1710 年的收入水平与 1990 年时的各国相比后，美国排在印度尼西亚前面，但却排在像安哥拉和玻利维亚这样的穷国后面。到 1840 年，美国人享有的物质福利水平足以使美国进入当今最富有的那一半国家的行列。1840 年美国人的收入水平大

① 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刊登在 1993 年 5 月 20 日的《纽约时报》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研究报告。该报告根据人民币的购买力而不是根据美元来计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重新估计后，中国从 GNP 约为 4000 亿美元的第 10 经济大国一跃而为 1992 年 GNP 约为 1.7 万亿美元的第 3 经济大国。这样的修正对于增长率的计算和人均收入的估计有根本性的含义。

表 1.2 以今天看昨天：美国历史上的繁荣程度

名次	国家	人均 GNP(单位 美元)(1989 年价格)	年增长率(%) 1965—1989 年	预期寿命 未标明年份的 均指 1989 年出生
124	莫桑比克	80	无	45
123	埃塞俄比亚	120	-0.1	46
122	坦桑尼亚	130	-0.1	45
121	索马里	170	0.3	48
120	孟加拉国	180	0.4	51
		—	—	—
	1710 年的美国	550		
82	安哥拉	610	无	46
81	玻利维亚	620	-0.8	54
		—	—	—
76	菲律宾	710	1.6	64
	1775 年的美国	750		
75	多米尼加共和国	790	2.5	67
		—	—	—
60	泰国	1220	4.2	66
59	牙买加	1260	-1.3	73
	1840 年的美国	1350		
57	土耳其	1370	2.6	66
		—	—	—
38	匈牙利	2590	无	71
37	乌拉圭	2620	1.2	73
34	1880 年的美国	2650		
36	南斯拉夫	2920	3.2	72
		—	—	—
24	沙特阿拉伯	6020	2.6	64
	1929 年的美国	6150		
23	爱尔兰	8710	2.1	74
		—	—	—
19	新加坡	10450	7.0	74
	1945 年的美国	10450		
	1960 年的美国	11100		
18	新西兰	12070	0.8	75
		—	—	—
7	丹麦	20450	1.8	75
6	美国	20910	1.6	76
5	瑞典	21570	1.8	77
4	芬兰	22120	3.2	75
3	挪威	22290	3.4	77
2	日本	23810	4.3	79
1	瑞士	29880	4.6	78

来源：《1991 年世界发展报告》(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 年，为世界银行和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出版)。

致相当于今日普通土耳其人或普通牙买加人的收入水平，并且 1840 年的美国人的日子过得比今日不怎么繁荣的拉丁美洲国家（如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拉圭和秘鲁）的居民要好。到了 1880 年，美国人拥有的购买力与 100 多年后的乌拉圭或南斯拉夫（在其不久前因种族暴乱和内战而解体之前）的普通居民的购买力相等。今天，按人均收入计算，美国排在世界第 6 位，因为美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被日本超过。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这段时间里，美国的人均收入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

美国虽然人口众多，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估计，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日本的 2 倍多；并且也许比欧洲经济共同体各成员国 GDP 的总和还要大 10%。

南北战争前的早期增长

独立战争前夕的美国经历的是外延式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快速增长的人口和供给实际上无限的土地共同推动的结果。此外，此前二、三代人的生活水平已逐渐得到改善，人们现在过着一种在满足了生存需要后还有点富余的生活。的确，成百上千的商人和农场主过着奢华的生活，而构成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核心的成千上万的农民家庭和熟练工匠，其生活虽非常一般，但在经济上仍有保障。然而独立战争使殖民地陷入新的、国内国际都很动荡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

高尔曼对 1840 年人均收入的估计为 109 美元(按 1840 年价格计算)，这一数字几乎是独立战争前夕人均收入的 2 倍。而这意味着英国对殖民地进行干预时期的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将近 1%，或者说高尔曼的估计使得独立战争前的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翻了一番多。此外，到 1860 年，人均收入已升至大约 144 美元，或者说，1840 年以来的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 1.5%。很明显，经济增长模式一定在独立战争与南北战争之间的某个时间发生了变化。问题是这一变化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对此，人们的看法分歧相当大。

传统观点——即 1967 年以前的观点——作如是说：1790 年后，由于美国对外贸易在拿破仑战争中十分兴旺，所以美国经济非常繁荣。接着，杰斐逊总统决定中止与交战各方的商业往来，由此导致美国从世界贸易中退出，并造成 1807 年后人均收入的急剧下降。

后面的故事大家就有分歧了。但情节梗概仍相似。罗伯特·马丁做的早期研究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末出版，他认为人均收入在将近 30 年的时间里一直在下降，直到一个持续快速增长阶段开始之前才于 19 世纪 30 年代达到最低点。人们都是有保留地接受马丁的观点，而在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国民收入核算的先驱西蒙·库兹涅茨，以及威廉·帕克和弗兰克利·沃滕拜对马丁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后，人们对马丁的研究就持更大的保留了。但当时没有一个人完全接受库兹涅茨的如下激进推测：人均收入在这一时期实际上是上升的。例如，农业历史学家马文·汤和韦恩·拉斯马森就认为，地理上的迅速扩张成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上升的一个很大累赘，从而使经济中主要部门的人均收入水平下降。当然，经济是在人口快速增长造成的压力下外延式增长的。当土地因种植烟草（以后是棉花）而地力耗尽时，农民负担由此日益加重，但仅为维持原状，美国就不得不卖命地干。由市场更为遥远所导致的运粮费用上升仅为水上运输的改善所抵消。直到 19 世纪 20 年代的某个时候，情况才发生逆转，这有赖于农业器具的改进和四通八达的运输网。

美国早期国际收支表（估计值）的编纂者道格拉斯·诺思，在强调 1790 年至 1807 年间美国外贸兴旺时的生产率增长也很可观后指出〔见诺思（1961）〕，贸易禁令后美国外贸下滑非常之大，以至于显著的增长只是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才再次开始。1835 年的人均收入因此低于 1800 年的人均收入。乔治·罗杰斯·泰勒则试图在诺思与汤和拉斯马森之间取一折衷，他在其 1964 年的论文里认为 1775—1840 年是一个总体上没有任何进步的时期；殖民地后期生产率的增加仅仅抵消了地理和人口扩张导致的生产率下降。

上述观点尽管分歧很大，但它们有一共同的主线：美国经济的转折点出现于 19 世纪 20、30 年代，其标志是经济增长突然加速（见图 1.1）。这一加速就是新经济史学的先驱沃尔特·罗斯托所说的“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阶段所需的起飞”。罗斯托把美国的“起飞”归因于 19 世纪 40 年代铁路网的扩张。据罗斯托解释，铁路部门对投入品的需求以及铁路运输服务对消费者的影响，使得铁路部门成为增长的引擎。铁路这一高效主导部门的发展以及高国民储蓄率的出现，随后刺激了其它产业的增长，直到增长本身成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为止。

这一“起飞”学说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因为“起飞”学说似乎对许多国家出现的急剧增长作出了解释。例如，英国的工业革命似乎就是由棉纺织业带动起来的。不过，国与国之间的这种急剧增长差别很大。作为世界上第